

環球同此涼熱

——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

中国战略研究基金会 编

环球同此凉热
HUAN QIU TONG CI LIANG RE
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 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 1740 信箱）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艾德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排版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mm 32开 11.5 印张 279,000 字 00,001-3,000 册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73-0193-1/D·54

定价：10.80 元

前　　言

199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为了缅怀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全面学习和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和《世界知识》编辑部于今年9月中旬，在北京联合举办了“毛泽东及老一辈革命家国际战略思想研讨会”。现在，提交这次研讨会的一批学术论文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结集出版。

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党珍贵的理论财富之一。作为一个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同志在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中，始终注意观察国际上的风云变幻，分析研究各种矛盾斗争的变化，把握国际形势发展的全局，高瞻远瞩，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制定战略和政策。正是这些正确的战略和政策，使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走向胜利，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向前发展，为中国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地位。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形成的过程中，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外交家也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关于国际问题的一系列重要论述，高屋建瓴，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是新时期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

当前，国际形势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国际上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新格局的形成仍需一段长期、复杂的过程。今后较长一个时期内，虽然国际和平大局可以维持，但天下并不太平，阻碍和平与发展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依然十分猖獗，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仍将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进行。在这种形势下，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国际战略思想，学习他们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博大精深的韬略，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以及高超的斗争艺术，继承他们立足中国、放眼全球的革命气概和胸怀大略、处变不惊的英雄本色，对开展我国新时期的各项工，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应该指出的是，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是一个丰富的理论宝库，我们对它的研究和探讨还处在起步阶段。这本论文集仅仅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其中的观点和文字都难免有不当之处，有待各界读者批评指正，共同探讨。

最后，我要对撰写论文的全体作者，以及在论文集编写出版过程中给予我们大力支持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世界知识》编辑部、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和中央文献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向为本次研讨会及本书的出版提供赞助的奔德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华兴公司、中国华兴贵州实业发展公司、海南物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捷顺健康食品有限公司、李楠先生、河南省新郑卷烟厂、湖北省当阳卷烟厂和北京国安广告公司表示衷心的感谢。

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会长

江泽

1993年12月于北京

润泽东方

(代序)

秦晓鹰

我们这本书所要纪念的这个人，他的名字已永远和 20 世纪的中国，20 世纪的东方与世界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一个伟人的国际战略思想离不开他对世界的总体认识。研究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自然会追溯到他的青年时代。对毛泽东来说，那是一个灵魂飞扬、精神昂扬与文字激扬的时代。这个主张“大出国观”的湖南学子，虽然没有镀过金（留学西洋），镀过银（留学东洋），但他却以提出“民众的大联合”反对“强权者的联合”，表示了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事务的关注。

随着毛泽东从一个暂露头角的青年到成为全国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从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始人到中国共产党主席；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出现和战后格局的形成，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与世界的关系的思考也从闪光的思绪发展成为深刻的思想、完整的理论。在这期间，他的许多国际战略构想不仅促进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发展，而且对进步人类制止帝国主义战争、维护世界和平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他作为世界级的国际战略大师的地位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确立了。

当然，毛泽东不是神，他超凡脱俗的思想并非从天而降。事实上，他的许多国际战略理论在形成中吸收的是多种政治营养。例如，在他提出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代贤明政治家“一匡天下”的智谋韬略，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的真理，也可以看到中

国共产党人对自身经验教训的总结、概括与凝炼。

1949年毛泽东成为“新中国第一人”后，开始用更多的时间以其犀利的目光和深邃的思想去观察和分析世界。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子，他在处理与世界的关系时，当然要把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和尊严作为国际战略思想的基本出发点。作为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矢志于共产主义的真诚革命家，他的国际战略思想又必然会打着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人民伸张正义的烙印。

当然，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像毛泽东这样既是爱国者又是革命家的人并不罕见，但像他那样在国际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中取得巨大成就的却绝无仅有。原因何在呢？原因就在于毛泽东是一个绝不囿于书本、教条、陈规、戒律的实践家，一个能在实践中灵活运用各种战略原则的“艺术家”。他在革命战争中曾磨砺数十年，并由弱击强、由小搏大，由危转安、由衰及盛。他把在军事、政治斗争中屡试不爽的谋略巧妙地运用到处理国际事务中，就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出奇制胜、大开大阖的风格。这样，再复杂的国际风云，也能任他驰骋；再纷繁的世界潮流，也能任他舟楫。即便是到了晚年，在他与疾病相伴的最后岁月，他也能给多难的人类提供诸如“三个世界”的划分这样的东方智慧。

如今，人们不是常常爱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句话吗？周恩来在回答一个美国来访者的提问时，不是也说自己首先是中国 人，其次才是共产党人吗？那么，就让我们着重谈谈毛泽东的爱国主义思想以及这种思想在国际战略中的反映吧。

众所周知，几乎所有的西方“工业化民主国家”都曾在我们这片礼仪之邦、诗酒之乡留下过硝烟、铁蹄和废墟。老大的中央之国也曾不断向不请自来的先生们求教：日本的富国强兵之法、美国的民主科学之理、英国的商业法律之术，法国的文学艺术之论、德国的哲学军事之用，以及后来的俄国工业化之道。然而，这种“求教”的代价是昂贵的，最基本也是最巨大的代价就是国家主权

的丧失以及在世界上沦为末等民族。即使是前苏联在二战后也把恢复老沙皇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当作自己的远东目标。中国作为最后卷入世界工业化进程的大国，适逢西方的物质文明在全球竭力扩张之际。当时几乎没有谁会顾及她那悠久灿烂的文化，没有谁会体察这个迟来者的窘迫、生疏、被动与失措，更没有谁会明白中国人对列强欺侮与掠夺所抱有的震惊与愤怒。最有象征意义的是，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把中国人与乞丐和娼妓划为一类，均剥夺其移居入籍的权利。令人深思的是，这项法案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对日宣战后一年多才被撤销，历时61年。

中国人在追赶上现代化时遭受的屈辱愈烈、代价愈大，对于民族振兴的渴望也就在内心埋藏得愈深。唯其愈深，愈隐秘，而愈化为漫漫的梦、不屈的魂。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造访延安时，曾以女性的敏感和直觉惊讶地发现：在毛泽东的意识深处，有一扇门一直没有向其他人打开。可以说，这是一扇用长城、紫禁城护卫了数千年的古老和深邃的大门，也是一扇被各种起义、变法、革命“油饰”过的崭新的大门。

这扇门，终于在1949年向全世界敞开：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此时，毛泽东这个名字，已经不再属于一个人的生理时间，也不再是一个执政者政治生涯的标志。他已超越了生命，成为一个有5000年文明史的民族最杰出的代表。中国将从毛泽东时代扬眉于世界。我想，只有懂得这一点，才会对毛泽东所制定的一系列国际战略和外交方针有一个最基本的理解，也才有助于我们在探讨他的国际战略思想时避免不必要的偏差。

今天，以两极对抗为特征的冷战时代已经结束，中国以空前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20年前，到中国来访问的美国官方人士与前苏联的民间人士，恐怕比这两个国家送往太空的宇航员多不了几个；20年后，在中国任何一个大中城市都能遇到一批批讲英语或俄语的“洋人”。这说明：中华民族正在坦诚地吸纳世界现代化潮流的浩大气息，世界也在大步地向中国走来，“万物并育而不相

害，道并行而不悖”，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人的寻常心态。当代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也使她对外部世界的诉求与以往大不相同。从这些变化来看，必然要给予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以新的时代内容、时代精神和时代面孔。在 90 年代的世界，另一个事实也鲜明地存在，那就是冷战意识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立即消散。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和政治谋士不懂得，在冷战结束的棋局上并没有赢家或输家。在以胜利者自居的陶醉中，在诸如“人权”、“民主”等新的包装下，他们依仗自己的实力继续奉行霸权政策，充当世界警察。现实提醒了中国人，对毛泽东及老一辈革命家的国际战略思想应该倍加珍重；对他们一贯坚持的“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首先把国内的事情办好”等基本原则必须铭刻在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站稳脚跟，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争取一个更有利的国际环境。

几十年前，毛泽东用他的国际战略思想昭示世界：中国的革命绝不是俄国革命的亚洲版。

十几年来，邓小平用他的国际战略思想昭示世界：中国的现代化同样不是西方现代化的亚洲版。

“走自己的路”，邓小平与毛泽东息息相通；“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们与光荣的先人也一脉相承。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宣传部

目 录

前 言	陈 楚 (1)
润泽东方 (代序)	秦晓鹰 (3)
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研究	李 捷 (1)
毛泽东外交战略的起源	牛 军 (17)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初探	谭一青 (36)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	章百家 (50)
论“一边倒”政策的确立——1945—1949 年中 共与苏联关系的历史考察	刘德喜 (67)
50 年代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	陈雪薇 (82)
周恩来——红色中国外交的探索者和奠基者	章百家 (92)
论周恩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思想和政策 ..	李连庆 (109)
试论毛泽东国际战略的理论支点	胡长水 (124)
当代杰出的外交家陈毅	裴坚章、张光佑 (136)
陈毅与中国外交	陈小鲁 (143)
富有国际战略卓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张闻天	张培森 (157)
难能的探索，可贵的努力——试论王稼祥对党 的国际战略思想的贡献	张沱生 (170)
立足国家利益掌握国际战略主动权——叶剑英 国际战略思想研究	范 硕、丁家琪、金立昕 (184)

从“中间地带”论到“三个世界”的划分	李向前	(198)
毛泽东的外交谋略及实践	江凌飞	(215)
我党关于党与党关系原则的形成和发展	陈雪英	(230)
试论建国后毛泽东的战备思想	徐 焰	(241)
毛泽东的美国观	何 迪	(254)
毛泽东怎样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	宫 力	(270)
西方关于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与中国对外政策 研究述评	王 勇	(288)
八九十年代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核心问题	陈登才	(306)
紧紧抓住时代主题，加快改革开放步伐——从 国际战略高度领会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理论	郑建民	(315)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与邓小平的国际战略 思想	高 竣	(324)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当代中国外交的理论 基础	周尊南	(335)
对中国国际战略的几点看法	薛谋洪	(353)
后记.....		(359)

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研究

李 捷

毛泽东是一位具有非凡的洞察力和宏伟气魄的伟大战略家和思想家。他高瞻远瞩，善于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抓住主要矛盾，驾驭全局，把握千载难逢、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及时调整战略策略方针，作出符合实际情况的决策，牢牢掌握有利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形势和趋向。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对国际战略格局的观察，以及由此产生的科学的国际战略思想。

一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战后的世界，逐渐形成以美、苏对峙为特点的格局。在西方，冷战理论成为居主导地位的国际战略理论。作为世界另一极的苏联，也把避免美苏冲突作为国际战略的重要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通过对国际形势的冷静观察，透过表象看本质，想人所未想、发人所未发，独辟蹊径地提出对国际战略态势的独到见解。

毛泽东在1946年8月6日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美国反动派说，他们在世界各地已经建立和准备建立的一切军事基地，都是为着反对苏联的。不错，这些军事基地是指向苏联。但是，在

现时，首先受到美国侵略的不是苏联，而是这些被建立军事基地的国家。”^① 这就是著名的“中间地带”理论，也是毛泽东在 50、60 年代观察世界格局变化、制定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它的提出，可以视为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初步形成的标志。

同年 4 月，毛泽东还针对国际形势的一种悲观论点，写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科学地分析了战后国际形势的基本趋向。他认为：“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因此，美、英、法同苏联的关系，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的问题，而是或者较早妥协或者较迟妥协的问题。”^② 接着，他又实际上批评了那种要求各国人民的斗争服从某些大国的战略需要的错误做法，提出：“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③ 正因为树立了这样一种立足本国、独立自主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才能顶住外来的巨大压力，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凭借自身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仅用了三年多一点时间，就战胜了依仗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军队，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进一步发展，达到成熟。

建国前后，毛泽东作出“一边倒”即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的战略决策。他首次访问苏联，初步消除了一些隔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193—1194 页。

② 同上，第 1184 页。

③ 同上，第 1185 页。

阂，争取到有利于我的支援，打破了西方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同时，他主张力争和一切平等待我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团结国内国际的一切力量击破内外反动派，我们就有生意可做了，我们就有可能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之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了”^①。在发展对外贸易关系上，他还提出“统筹全局”的观点，“苏联当然是第一位，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②。

毛泽东鉴于中国近代以来长期被动挨打的屈辱历史以及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切身体验，痛感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极端重要性。1951年2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长远设想。从1952年9月起，又酝酿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把实现国家工业化作为长期的奋斗目标。1953年7月26日，他在会见印度艺术代表团时表示：我们在有一点上吃了亏，那就是我们缺乏工业。工业化起来，帝国主义就不敢欺侮我们了。我们要按照计划，使我们的国家工业化。

从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长远目标出发，毛泽东提出要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的问题。他根据对50年代国际形势的冷静观察，曾经提出争取一二十年的和平环境是有可能的正确论断。1954年8月24日，他在会见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一行时指出：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经常打仗不好办事，养许多兵是会妨碍经济建设的。我想，如果诸位同意的话，我们要继续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想这也是英国、法国所需要的。同年10月23日，他在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谈话中又明确表示：我们现在需要至少几十年的和平，以便开发国内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不愿打仗。假如能创造这样一个环境，那就很好。凡是赞成这个目标的，我们都能同他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3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97页。

合作。

为了创造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的国际环境，毛泽东首先以很大的精力同周边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并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加以推广。建国之初，毛泽东提出要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基础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成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先导。1953年12月，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总理在同印度政府代表团谈判期间，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毛泽东又进一步表示，这五项原则应当适用于各国之间的关系。1954年12月11日，他在会见缅甸总理吴努时提出：五项原则是一个大发展。我们认为，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五项原则也是适合你们国家的情况的，适合亚洲、非洲大多数国家的情况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确立，为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奠定了基础。

根据国际形势的新特点，毛泽东进一步阐述和发挥了“中间地带”理论。进入50年代以后，亚非拉国家的民族民主运动迅猛发展，许多国家纷纷摆脱殖民主义枷锁，赢得了独立。一时间，人民民主和民族独立运动汇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给国际局势的发展带来新的特点。广大中间地带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地位，显得日益重要。这为中国打破西方国家的孤立和封锁，广泛结交“穷朋友”，确立有利于我的国际战略格局，提供了很好的机会。1956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时指出，要注意中间地带的重要性问题。他认为，中间地带包括从英国一直到拉丁美洲。这个地区的一边是社会主义阵营，另一边是美国。这个地带有最多的人口和最多的国家，包括有三种性质的国家。第一类是拥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第二类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有的已经取得民族解放，有的还正在争取民族解放。第三类是在欧洲的不拥有殖民地的自由国家。在这些中间地带国家之间存在着一些内部纠纷。这些纠纷

应该用和平方法解决。在后来的一些谈话中，他还进一步指出，现在美苏双方都在争夺这块中间地带。1957年1月，毛泽东根据对苏伊士运河事件的分析，又进一步提出帝国主义国家争夺的主要场所是亚洲和非洲。他还说：“对于国际问题的观察，我们认为还是这样：帝国主义之间闹，互相争夺殖民地，这个矛盾大些。他们是假借跟我们的矛盾来掩盖他们之间的矛盾。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矛盾，这里很有文章可做。这是关系我们对外方针的一件大事。”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积极支持亚非拉人民的反殖反帝斗争，对已经独立的亚非拉友好国家给予尽可能的援助，极大地提高了自己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和威望，给新中国的外交注入了活力。

毛泽东还进一步发展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点，提出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策略思想，以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利用反动堡垒的矛盾的方针。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同年7月14日，他在同拉丁美洲人士谈话时指出：“我们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是从战略上来说的。从整体上来说，要轻视它。从每一局部来说，要重视它。”1958年12月1日，他在一篇文章中又提出：“从本质上讲，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① 在当时，“苏美缓和”、“一点火星会导致核大战”和所谓“戴维营精神”的宣传甚嚣尘上。毛泽东针对这种情况提出这一系列论点，是很有见地的，在第三世界国家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07页。

三

从 60 年代开始，国际战略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中苏两国由于意识形态问题上的重大分歧，导致国家关系日渐紧张，原先的社会主义阵营开始解体。与此同时，在西方阵营，对美国的离心倾向有所发展，法国等发达国家同美国的矛盾逐渐显露，一些有识之士提出“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的口号，来与美国的国际战略意图相抗衡。为摆脱各自的困境，苏美两国开始频繁接触，在抗衡、竞争的同时，谋求某些协调与缓和。面对这些新的变化，毛泽东陷入了沉思。

从 50 年代后半期起，中苏两国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战争与和平、和平过渡等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苏联领导人从大国主义出发，不惜以恶化两国关系相要挟，先是拒绝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有关资料，继而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并在 1960 年 6 月举行的社会主义各国党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国代表团进行围攻，企图压我军范。面对巨大的压力，毛泽东豪迈地宣布：“我们从来就不接受强大力量的威胁，不接受这样的威胁，在我们力量再小的时候也是如此。”他率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捍卫了国家的尊严和主权。

中苏交恶，使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中国面对两条战线，一条战线是反对当时称之为国际修正主义的苏联，一条战线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因此他多次强调，要有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对于苏联，还是要多做工作，坚持原则，但又要防止破裂。

为了实现上述战略方针，毛泽东根据国际战略格局的新变化，进一步发展了“中间地带”理论。他提出，在美苏之间，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不发达国家，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大洋洲、加拿大、日本等发达国家，是第二个中间

地带。他还明确宣布，中国是不发达国家，属于第三世界。他赞许法国戴高乐总统摆脱美国控制的斗争，并称这种斗争的实质是控制和反控制。他提出各国人民应该管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不允许任何外国势力的干涉。在处理复杂微妙、反复变化的国际矛盾中，他还为中国外交规定了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方针，避免陷入被动的局面。

在上述方针的指导下，60年代我国同亚非拉不发达国家的友好关系得到巩固和发展，同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取得突破，同日本等国的民间交往日益增多。尤其重要的是，在美国干涉越南，印度支那重新成为战后热点地区的情况下，中国仍能在战略上保持较多的回旋余地。这再次显示出毛泽东驾驭国际社会诸多矛盾的卓越才能。

然而，随着在国内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日益严重，尤其是批判所谓“三和一少”，并开展中苏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以后，“左”的迷误同样影响到中国的国际战略领域，从理论到实践都出现了一些偏差。在客观上使我陷于腹背受敌、两条战线同时作战的境地，在国内政策上又逐渐偏离了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这不能说不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四

1969年3月，中苏边境发生珍宝岛事件后，我国在国际战略指导思想上的问题充分暴露出来。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提出：“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

然而，毛泽东不愧是善于审时度势、捕捉历史机遇的国际战略大师。他清醒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酝酿对国际战略作出一生中最为果敢的重大调整。就在中共九大闭幕不久，他委托